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编者按:最近时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成为中日两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历史与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影响,则更为历史学者关注。如何认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目前显有不同观点。这种分歧主要是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但也包含了由于认识历史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学理方面的分歧。针对后一种情况,本刊认为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对于推动历史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是有必要的。作为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本刊展开此种讨论,主要是以剖析学术观点为目的。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故展开此种讨论,也是为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辨别政治观点的是非。本刊认为,产生观点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学术争鸣,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本刊举办“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本笔谈以来稿时间为序。需要说明的是,本刊真诚希望为勇于探讨真理的学者提供一块争鸣的园地,但受篇幅限制,不能邀请更多学者参加笔谈,同时,也不能为参加笔谈者提供更多充分发表见解的空间,敬请作者与读者谅解。

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所危险的重大忧患。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然而为什么现在可以说更重要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个忧患。对此,应当有所着急:不是为日本人,而是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说,要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一个是从大战略权衡出发的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我们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须集中应对巨大、复杂甚至往往艰难的美国问题,当然并不指要与美国在总体上对抗或冲突,也不是说仅仅或首先为了对付美国而争取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要集中应对棘手的台湾问题。此外,朝鲜半岛问题(当前首先是朝鲜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将分散相当大一部分精力。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尚未较好解决,以后很可能还会由此出事,但是从最重要的目标出发,我们要坚韧地执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对日政策,奉行战略集中原则,更

好地实施我国的大战略。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宿怨?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可以主张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真正解决,以便绕过障碍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世界上不少事情的解决需要大历史条件,它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创造、促进和积累。等到中国将来真正强大了,在国际上既有威望又有办法,并且在日本公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甚或很好的解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中苏(俄)关系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从沙皇,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国间的宿怨很多很多,如果沉溺于历史宿怨,就可以天天吵架骂对方。但是从邓小平以来,通过两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俄关系现在发展良好。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能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对于过去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在中国的重大外交成就当中,有不少首先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不忘记过去受侵略受侮辱的历史,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自己。不能说过去的敌人一定就是现在的敌人,或者一定就是将来的敌人。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坚持“以史为鉴”的同时,不能让对过去的全部记忆代替对现今的观察和对未来的构想,不能让它们遮盖或者混淆当前应有的大战略权衡。除了中国的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逐渐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外,有多少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大致搁置的?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八年抗战结束,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要振兴,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强国,以便除其他基本目的外,使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任何可能的变化中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而且留给我们尽可能有利地应对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多。除了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我们应该有讲求实际的外交和战略,而且对任何国家都应该讲求实际。外交和战略一般不可能追求完美,有时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增长及其使命的扩展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说过头话有弊无利,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对日本的国内政治右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和日本在其中军事作用的增长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将立足点放在加速建设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战略上。

现在看起来比较难办的事情主要是历史问题与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的政府、研究界和对公众的思想舆论有影响的人们,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要善于理解、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近年来的对外事务公众舆论证明,公众也在学习,也会改变一部分不正确的想法。要引导、带领公众向前看——从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出发向前看,这是对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未来负责。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

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大度与内心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要以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我战略警戒和台湾问题为战略中心,只争朝夕地加速我国军队的全面的现代化建设。

胡锦涛主席关于“放眼长远,筹谋大局”的主张非常正确,在中日关系的方向构建上具有根本意义。他说,中日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肩负重要的责任。两国领导人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处理中日关系,这就是筹谋大局。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放眼长远,筹谋大局?首先应该有以战略关系为框架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带有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论这思维是旧还是新。要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体系以“友好”为本的情感式外交的框架,重新思考以坚持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能够令中国满意的全面和深刻反省作为发展中日政治关系之根本前提的设想,改而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即一是防止中日敌对,二是争取建设适当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某些为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战略性协作。现在不少日本人强调中国威胁论,害怕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我们许多人也担心他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复活,还有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和导弹防御系统等等问题。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和应对,同现在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极难实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更紧迫、更重要。应当从大战略的权衡出发,以中日战略关系为中心,通过战略对话、战略协商甚至某些战略性协作,争取双方向着和平与共同富强的目标前进,而且享有各自适当的国际地位。

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不是无条件的,有一条必须作为保留,那就是除非日本政府从它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严重地大倒退。如果发生这种大倒退,那么

一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考虑,尽管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这可以说应当是我们的一条“底线”:既是现在对待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底线,也是对待整个中日关系的底线。

期待日本拿出行动

吴学文

(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中日关系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一是台湾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否则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

中日两国政府在 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这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承诺。由此,中日关系在复交后约 10 年中,有了顺畅而全面的发展。

但是,1982、1986 年连续发生了教科书事件,这些美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教科书都是经日本文部省审查和认可的,它对日本政府在 1972 年联合声明中的政治承诺造成了破坏,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日本本来可以在 1995 年战后 50 周年之际由国会通过决议,再次表明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但日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由村山首相于 1995 年 8 月以

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形式表示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国人民认为,村山首相的这次谈话与 1972 年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的政治承诺,都是政府行为,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也认为历史问题可以划个句号了。

然而,与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相反,一本《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村山首相发表谈话一年之后于 1996 年 8 月由“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由 105 名国会议员组成,由 19 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学术界、旧军人“主讲人”进行了 20 次讲演,出席的国会议员达 1116 人次。委员会把这些讲演编辑成《总结》。《总结》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说什么九一八事变和炮制伪满洲国是日本的“防卫战争”;七七事变“不是日本挑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中山贞则在《总结》的前言中写道:“现在的一代人对大东亚战争已没有任何记忆”,希望这本书“把正确的历史观和正确的团体论,传授给那些已到了成为政治家年龄的人们”。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发行后不到半年,一个由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 1997 年 1 月出现在日本。编纂会的会长西尾干二、副会长高桥史朗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主讲人”和《大东亚战争总结》的执笔者之一,说明这两者有着“血缘”关系。“编纂会”的宗旨书说:战后的历史教育忘记了日本人应继承的“文化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骄傲”。该会鼓吹确立“自我本位”,向日本青年灌输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和“皇国史观”。这同《总结》的前言是一脉相承的。而“编纂会”在美化侵略战争方面,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编写的 2002 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把日帝吞并朝鲜实行殖民统治写成“1910 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一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把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疯狂掠夺,写成“由于日本重工业的进入,满洲国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经济得到了发展”;日本曾在二战中把发动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名为“大东亚战争”,新编的这本教科书仍然写道:“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军打败盟军,使长期在欧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增加了勇气。”

“历史研究委员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和新历史教科书的前前后后,动员了一两万人到日本全国各地进行了几百次的宣传鼓噪,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右翼思潮。

对于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政府采取了“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予以放行。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鉴定调查审议会审定通过了8本历史教科书,其中包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首次参与审定的教科书。

4月2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和严正立场,允许“台独”总后台李登辉以“治病”为名去日本进行政治活动。

也在这年的4月,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纯一郎把修改宪法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列为他的竞选纲领,战胜对手出任自民党总裁,于4月26日组成新内阁。8月13日小泉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的言行使日本右翼思潮大肆泛滥,右翼势力则以提高小泉内阁的支持率予以回报。小泉纯一郎正为《大东亚战争总结》的前言中所期待的那样,在他“到了成为政治家年龄”的时候,把《总结》的“正确历史观和正确的国体论”,传给了他。

2001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李登辉访日和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对1972年中日复交的联合声明和1995年村山首相谈话的严重违反,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国关系出现了倒退。这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人民的忧虑。

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问题,是胸怀宽广、不念旧恶的。周恩来总理早在1961年就曾说过:“有上千上万的日本朋友

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促进中日友好关系。”陈毅副总理在会见日本朋友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说:“日本过去很长时间对中国人是盛气凌人的。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当日本朋友说日本人对过去侵华战争负有责任,“我们是不能忘记过去的”时,陈毅副总理说:“说得很好,谢谢你们。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们说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事。这样两国人民才能真正友好。如果我们总是恨日本,而你们日本人把伤害中国人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中日两国就永远不能友好。”

正是基于这样的胸怀,中国在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以后,没有提那段历史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历史问题引起的中日不睦,每次都是由日方挑起的。在日方把侵略中国东北说成是“建设王道乐土”时,中国基于中日复交的原则和维护国家尊严,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正的批判,这不能说是“过于刻苛”。我们绝不是揪住历史辫子不放,而是日本政府放纵日本右翼坐视其破坏中日关系。

现在需要日本政府拿出行动,表明它回到《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立场上来,使中日关系得以修复,进而把一个良好、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推向 21 世纪。

逻辑混乱的“新思维”

白竞凡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离休干部)

马立诚先生在《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6 期发表《对日关系新

思维》,拜读之后我非常震惊。我认为,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现实,都不能脱离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新思维”之“新”,恰恰是抛开了因果关系的分析,其结果只能是立论的逻辑混乱。试举例如下。

一 中日民间之忧,忧在何处?

赵薇身着日本太阳旗遭到全国声讨,马先生称此现象反映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是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这里,马先生抽去了事物的因果条件。日本太阳旗曾是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象征,这是饱受摧残的中国和亚洲人民憎恶它的根本原因。即使在日本,也不时有和平进步人士反对在学校悬挂太阳旗。如广岛县教育委员会于1999年2月向各县立学校提出“职务命令”强令各校升太阳旗和唱歌颂天皇的“君之代”国歌,该县世罗高中教职员工仍坚决抵制,该校校长石川敏浩在两方面压力下自缢身亡。应该承认,在越薇事件中,确有少数人行为过激,但马立诚把它概括为中日民间之忧,就不仅是抽去了而且是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我认为,中日民间之忧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日本。中国固然有过激行为者,但他们的影响却远远达不到日本极端右翼的社会影响程度。据日本警方统计,日本全国右翼小团体有1000来个,其积极分子有9万人(见1996年10月17日《参考消息》),其中还不包括“日本遗族会”这样的在日本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型右翼团体。

这些右翼组织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的,“国会议员联盟”、“青年社”、“青年自由党”、“不辜负英灵会”等等。他们经常坐着卡车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示威,用高音喇叭播放颂扬“大日本帝国皇军”“丰功伟绩”的口号。2000年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大规模集会,否定南京大屠杀,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这些右翼团体与

他们的活动,难道不是最大的中日民间之忧吗?

二 是谁在搞民族主义?

马立诚先生指责中国“民族主义狂热”、“民族主义飙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说那些“煽动情绪化的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并究其原因“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我不敢苟同马先生的观点,且不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狂热”、“飙升”到出现“爱国贼”的程度,仅以“中国长期教育”而言,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走偏”。爱国主义理应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应该反思,我认为问题是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还远远不够。除前述赵薇之例,我还有一事例:在 1982 年,我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就听到一对青年男女的对话,女青年说:“真是的,中国抗什么日啊!谁来领导还不行?”我听了以后非常吃惊,尽管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多数青年,但也足以说明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多么欠缺。而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他们懂得民族自尊自强,比起懂得“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显然更为迫切。

再来看看究竟是谁在搞民族主义?日本右翼分子一贯地在搞民族主义。当年策划侵略战争蓝图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就说过:“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志的民族”,而他所说的“大志”,不就是要由日本来征服亚洲和世界吗?现代的右翼分子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为当年的侵略战争翻案,鼓吹“解放亚洲”论,不是仍然肯定用“优秀的大和民族精神去震慑劣等民族使他们彻底臣服于大日本帝国肢下”的合理性吗?

其实,日本右翼无论新旧,他们的言论已经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而实质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映。相比之下,马立诚先生把“民族主义”的头衔加在中国人头上,是不公

平的。

三 在中日关系中到底是谁苛刻？

马立诚提出：“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 60 年。”马先生的议论，又颠倒了因果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中日关系中表现出苛刻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到底谁苛刻？让历史事实来作证吧。

先看日本对中国。1894 年日本发动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是战胜国，订立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不但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索要赔款 2.3 亿两白银。这一索赔等于日本年收入的 5 倍，所以日本经济得到第一次腾飞。而当时中国年收入只有 8900 万两，只有用高利贷向西方借款赔给日本，结果使中国工业窒息，经济凋零，民不聊生。日本这个战胜国对中国不苛刻吗？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与中国订立了辛丑条约，日本是八国联军的主力，又成了战胜国，除了获得驻军治外法权开商埠以外又抢了 367 万两白银，索赔了 3479.3 万两白银，对中国仍无“宽大为怀”可言。

1904 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三省的权利，发动日俄战争，最后日本战胜，日本又以战胜国的面目与中国定了一个附约，不但让中国承认日俄两国订的《朴次茅斯条约》“概行允诺”，又索取了东三省的一系列新权利，把中国视为战败国。这些不都是十分苛刻的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协约国之名，占领了当时德国把持的中国领土山东。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也是战胜国，但战后日本拒绝将山东归还中国，两国“气度”形成鲜明对照。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八年中使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财产损失 5000 万美元。日本对中国已经不是苛刻而是要残酷灭绝。

再看中国对日本。在八年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但是在 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接着又主动的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共同宣言》,奠定了中日友好的基础。特别是中国以大局为重,将历来属于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予以搁置,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在 2002 年中国隆重纪念中日建交 30 周年,邀请了日本各界万名人士到中国。可见,中国对战败国日本历来采取的是“宽大为怀的态度”。

可是,中国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日本的回应,就在 2002 年一年中日本却做了许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情。特别是在 8 月间,“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 29 届年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陈水扁在台湾向这个会议致词,提出所谓“一边一国”和以台湾民众公决的办法实现台湾独立的谬论。这是日本支持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铁证。2002 年 4 月 6 日,日本自由党首小泽一郎说:“虽然中国声称拥有核弹头,如果日本愿意一夜之间就可以拥有数千枚核弹头。”公然向中国挑衅。可是中国仍然以宽大为怀的态度邀请日本来中国 13800 人,于 9 月 28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日建交 30 周年纪念会,并没有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伤害而取消了这个纪念会。这个气度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思维”逻辑混乱,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探讨中日关系,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当前中日历史问题的基本特征

冯昭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中日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 1972 年 9 月 25 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下午,与中方主要官员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麻烦了”,为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主席 1972 年 9 月 27 日在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30 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那么,当前中日历史问题有哪些基本的和新的特征呢?

第一,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对朝鲜、台湾等的殖民统治进行否认甚至美化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治家。日本的主流政治家(例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尽管在对整个二战的看法上,持有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识很不相同的看法,但承认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对朝鲜实行了殖民统治。中曾根的历史认识在日本政治家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

随着日本政治家的新老交替,所谓“新生代政治家”走上日本政治舞台。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咎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

比,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新生代政治家对侵略战争历史更缺乏负咎感和责任感,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吃惊,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尽管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而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没有亲身感受。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过去事情”的情绪,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年轻人中间则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要算帐找爷爷去,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日益发展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三,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特别是村山富市首相在 1995 年 8 月 15 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合格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不过,近

年来小泉首相固执地一再参拜靖国神社,被国际社会理解为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种“行动表态”、“以行动谈历史(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口头表态”与“行动表态”的分裂。

第五,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1. 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反差太大;2. 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第六,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

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 2001 年小泉上台两年来三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三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总之,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迫使我们不能不去重新认识“当今管理着日本的是一批怎样的人物”,“当今支配着日本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思潮”,认真思考如何跟新一代日本政治家和新一代日本国民打交道的策略和方法。

当前,我们处理对日历史问题,十分需要学习周总理在复交谈判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言行非常令人气愤,我们进行回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上日本右翼的圈套,因为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日本右翼就会跳出来制造事端和麻烦以阻止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如果我们不注意斗争方法,不注意团结广大的日本人民,就难免导致整个中日关系被日本少数右翼牵着鼻子走的局面。我们必须识破日本右翼不断选择关键时候力图破坏中日关系的阴谋。最近,中国外交部对又一次选择时机发出反华狂言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指出:“发展中日睦邻友好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破坏中日友好的企图都是不得人心的,更不会得逞。”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日外交政策的成熟、自信与理智。

中日关系不能回避“历史问题”

章伯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非常特殊而极具敏感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年,在这70多年里,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空前的民族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可谓史无前例。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1972年中日建交,两国本应以此为契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翻过这一页不愉快的历史,开创中日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但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频频制造事端,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要,言不由衷,令人愤慨,至使中日关系摩擦不断,前景堪忧。战后日本,在美国庇护下,保存了天皇体制,大批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军国主义思想未受到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为日后军国主义复辟势力重新滋生蔓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政治理念的斗争: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反思,揭露和批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的罪行;一种是极力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拒绝反省、谢罪。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后一种右倾翻案思潮,却呈愈演愈烈之势,时至今日,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可以左右舆论的主流意识。其特点是:由前期民族主义小团体的宣传鼓噪,进而发展成为有右翼政客参加,经济界提供

活动经费,知识文化界有人参与撰文著书制造舆论,新闻报刊渲染炒作。加上可以左右日本政坛的右翼政党团体的支持,包括一些现任和前任的首相、内阁大臣以及众多的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公开亮相表态,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口出狂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其影响与能量,远远超过右翼小团体街头闹剧式的鼓噪。战前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其毒害;战后旧的思想意识,仍在左右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极易接受右翼势力所散播的谬论,成为其支持者,并深深地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日本右翼势力深知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同与支持的重要性,故而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修改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1995 年遂有一些教授、学者出面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声称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反日史观”,“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重新认识历史”;同年底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2001 年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否认战争罪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

1995 年以后,日本的防卫战略方针开始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1996 年 4 月 17 日,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1997 年 9 月 23 日,日美又根据《宣言》共同制订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取代 1978 年以苏联为假想敌国的“防卫合作指针”。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曾毫不讳言地指明,“新指针”防卫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和南洋群岛。这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日美军

转引自[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译本,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51 页。

事同盟。嗣后又有《周边事态法》的出笼。近年来日美间举行的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联合军事演习,干预和介入台海局势已成为日美合作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政府要员曾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地区,日本“必须予以充分关注”。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日本却公然视台海地区为日本利益范围,妄图阻挠台湾回归祖国。这与日本帝国主义视中国东三省为日本“享有特殊利益”地区,并于1928年以军事干预相威胁,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进入东北,有何本质区别?

最近日本众、参两院分别于5月15日与6月6日通过所谓“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有事三法案”规定了在“紧急事态”下,政府应对方针的手续和在自卫队运用方面的特别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内阁首相据上述法案,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大权独揽,动用战争手段。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针对中国扩张军备的种种举措,岂能掉以轻心?在“历史问题”上任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如若充耳不闻,漠然置之,那我们的民族尊严何在!国人将何以面对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英烈?何以告慰当年惨遭日军杀戮的千百万死难同胞?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正是为了维护中日友好,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穿新鞋,走老路”,重温昔日军国主义帝国的“光荣与骄傲”(见1995年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活动方针)。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历来强调:日本要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要以史为鉴,并认为这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江泽民早在1995年12月19日在会见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时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持发展这一主流,同时对待错误观点要予以遏制。”(1995年12月20日《人

民日报》)2002 年 8 月 28 日江泽民在会见日共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时再次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2002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今年 4 月初,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华,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中日关系中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理性决策,它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理所当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近日笔者读到在一刊物上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6 期),另一篇是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同上刊,2003 年第 3 期)。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与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撇开”中日争端的历史问题发展中日关系为当务之急。按《外交革命》一文所说:“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无力改变的现状……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的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至推进,便可以获得‘正资产’。”笔者认为上述的“新思维”和“外交革命”所推导出的对日外交设想,有失片面。其理由是:一,两篇文章作者的“创新”思维,对近百年中日间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轻看和忽视了中国人民视为发展中日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所尊奉的“皇国史观”和思维方式,是其前辈军国主义者衣钵的继续与发展,大和民族至高无上、蔑视中国的心态,并没有多少改变,也没有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大国的地位,又促使其狭隘的民族心理膨胀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只要日本右翼势力当权,中国对日外交的宽容与妥协,未必能获得长久的中日友好,中日关系的现状,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三,“撇开”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这个“障碍”,委曲求全地去博取日本“民心”,可能会获取经济上的暂时利益,但所失掉的却是民族尊严和民心,因为

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外交革命”。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为殷鉴。当然理由不仅仅只是这些,但即使就此权衡,两者孰轻孰重,不说自明。因此说: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不容“撇开”和回避的。

历史问题岂可做交易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3 年 7 月 7 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 66 周年纪念日,却也是 20 年来最为寂寞的一个“七七”纪念日。推究其原因,一是 SARS,二是“对日新思维”。SARS 之作用正在消失,而“对日新思维”的影响力则不容低估。

“新思维”者主张中国不应再要求日本政要为二次大战行为道歉,要面向未来,要忘掉过去。严格而言,“新思维”者对日本的了解是相当片面的,对日本的国家目标、日本的保守政治、日本的右翼势力等,更是了解甚少,甚至犯了基本估价的错误。这里仅以历史问题为例。

战争认识的历史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社会问题。如果中日朝野具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和合作的信念,就可能有效地处理历史问题。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为曾是侵略国的日本对历史问题一再回避,没有丝毫真诚的历史交代,使亚洲各国大感失望。

“新思维”者还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多年来,尽管中国国内

确实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但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例如,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起诉、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处理的交涉等,都极少报道。我自己从事的“慰安妇”调查工作,在数年前也常常遇到各种善意劝告。再来看日本,其政府和政界却在不断地、刻意地制造“问题”和“麻烦”。小泉纯一郎上台以来,三拜靖国神社,就是明证。近年来,中国及亚洲各国受害者在东京的起诉一次次地遭驳回,也证明了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三不”(不道歉、不谢罪、不赔款)的无赖嘴脸。2002 年 11 月,在日本首相智囊团的日本对外政策新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加强与台湾的全方位关系,其牵制中国的目的,不言自明。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新政治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一旦日本全面重新武装,更会彻底否定与中国、亚洲之间的历史问题。而一个没有正确历史观但重新武装了的日本,本身就是东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我们常说,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中日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现在,作为侵略国的日本既无悔意,我们作为受害国的政府和国民,岂能以糊涂账糊涂销的心态和方式去漠视这段历史?就像有一个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的“朋友”,他不仅不道歉,甚至还拒不承认,拒不认错,我们还能当他是朋友么?

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因素,但也没有比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更能增进中日友好的事情了。如果日本政府真心是要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只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更进一步,中国就会投桃报李,中日友好关系就会大大推进。对中国而言,确实需要长期巩固的、友好的中日关系。然而经过 25 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完全没有必要靠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单方面让步而求得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外交战略方面,在暂时无法打开日本通道的情况下,不妨优先与北面的韩国、南面的东南亚形成合作的大局,如果这一

局面形成,该着急的就会是处于东亚合作的边缘地位的日本了。

走笔至此,东瀛又传来两则消息,一是日本自民党议员江藤隆美7月12日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是捏造的。二是7月17日日本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又放厥词,认为蔑称中国人的“支那”一词,“决不是坏词语,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这些言行无可辩驳地表明,“新思维”者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论断是多么的没有说服力。看来,缺乏历史知识和对日本了解的“新思维”者们不过是一种片面思维,一厢情愿,如果政府真的采纳了这种所谓的“新思维”,就有可能给国家人民利益和对外政策带来严重后果。

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怎么办?笔者在此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确立抗日战争研究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全面展开抗日战争史的调查和研究。50年多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选题分散、研究重复、研究深度不够、资料搜集零散、重大问题缺少重大成果等。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要求相比,抗日战争研究状况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我认为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项目之后,我国应尽快确立抗日战争研究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抗战史研究是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需要动员全国史学界、方志学界、政协系统和政府有关部门等力量;需要与香港、台湾史学界、海外华人史学家、日本进步学者及国际史学界通力合作。调查与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弄清历史事实,以无愧于祖先、牺牲者和后来人。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分工合作,加大投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查。尤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扎扎实实地进行实证研究,要做到真实细致,无可挑剔。决不能夸大与浮夸,那种以为自己是受害国,无论怎样高估受害情况都

可以的想法是错误的,是要不得的。如果有什么夸大了的数字,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纠正。

这一工作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变得刻不容缓。一些“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受害劳工、大屠杀的幸存者等正在衰老和离去。在日本广岛,政府给每个受害者拍摄一段讲述可怕历史的录像,保存在纪念馆里;现在尽管很多老人已经离去,但后代仍然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亲人讲述的历史。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整保全幸存者口述历史的计划。同样,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许多具有保存价值的抗日战争纪念建筑以及集中营、慰安所、俘虏营、日军据点等正在消失。我们需要做抢救性的调查和保护。

第二,我国应该建立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隆重的纪念抗日战争的永久仪式。在俄罗斯,自 1996 年起,将德国入侵苏联的 6 月 22 日作为国定“缅怀和哀悼日”。在战败国的日本,从 1963 年开始,每年的 8 月 15 日战败日(日本称终战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仪式,以示纪念。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全国“战死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由天皇和首相、众参两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及死亡者家属出席,会场上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者依次向“英灵”献花。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没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的仪式,来追悼千万的死难者,来哀思难以统计的抗日志士,来追忆 8 年抗日(东北 14 年抗日)艰难而卓绝的斗争历程。我们应学习俄罗斯等国,建立国家级永久纪念仪式。

同时,我国还应系统规划和建立各类抗日战争纪念馆,不忘国耻,教育来者。要知道,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日本人遗忘历史和歪曲历史,而是我们自己淡忘和漠视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近年来,哈尔滨投资近亿元,全面清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试验基地——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昔日的魔窟将在不

久的未来改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必须要做且是已经被延迟的工作。请不要忘记,日本广岛核爆炸遗址早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南京大屠杀尸骨埋葬地等也应该积极行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 ——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林治波

(人民日报社评论员)

时殷弘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认为: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时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不要太计较历史问题;多和日本做生意,适当减少和欧美做生意;对日本扩充军备,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不必说什么了;将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限于篇幅,未引原文。)

对时教授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时教授主张中日友好,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作用?

时教授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

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美日关系是主从关系,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支柱,外交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时教授联日制美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战后宽恕日本天皇和侵华战犯、阻挠中国对日索赔、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都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原因就是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左右逢源,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可见,时教授的主张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左道旁门。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日关系也就出不了大问题。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二、时教授的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难怪日方大为欢迎。

关于历史问题。时教授主张不要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这未免过于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也割不断;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记忆不可能被抹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丑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 13 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这没有问题;但主张“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就让人困惑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减少和欧美做生意?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太强烈了,为此不惜扬此抑彼。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主张对日本扩充军备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就不必说什么了。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但至今没有诚恳的认罪和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不让人担心。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对此,中国能不警惕吗?

关于尊重日本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一

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至于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就历史认识问题、战后遗留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列出若干条件与日方谈判,日方如同意或大部同意,中国可以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则,又何必给人家送免费午餐?

三、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事实上,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抚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教训,放弃原则立场,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时教授说:“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那样令人恐惧吗?纵观 50 多年来的情况,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居安思危固然应该,但过度的危机感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

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

时教授认为:“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同时不断发展经济、扩大市场,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跟从美国和需要市场的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需要日本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多少年来,许多日本左翼力量一直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奋斗。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他们感到困惑: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

“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与此相反,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有,资本家不请自来;没有,请也请不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原则。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凡熟悉近 20 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验。那就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无论国内国际,大都较为客观冷静,即使是讨论日本侵华罪行的话题,通常也都较为学术化。然而自 90 年代末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日趋明显地出现了情绪化、甚至政治化的苗头。今天,在不少讨论抗日战争问题的学术会议上,常常能够听到斥责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的激烈言辞,而这些言辞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影响了学术讨论应该遵循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导致部分学者的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情绪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日本自由主义史观思潮的泛起,和日本一些人在教科书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对当年战争罪行的顽固态度。但是,无论是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前,还是建交后,日本社会上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的思潮和现象,为什么过去我们几乎从未见到有谁试图把学术研讨会变成深挖日本侵华罪行的声讨会和斥责日本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会呢?很显然,除去日本方面的原因,以及中国现实政治环境较以往为宽松等因素以外,中国学人心态的变化应当也是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自 90 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的国力日渐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高,伴随而来的,则是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显升温。这种情绪

自然也波及到学术界中来了。因为逐渐开始热衷于看到政府在国际关系当中对人说“不”，因此，日本政府及其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过去战争罪行的态度，难免会愈加激起部分学人情感上的愤怒。

学者也是人，人总有七情六欲。对历史上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深恶痛绝，对现实中日本政府和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抹杀甚至美化日本战争罪行的态度忿忿不平，这些也都在情理之中。但是，因为不理解日本人在过去战争期间的残暴和部分日本人始终不敢正视自己战争罪行的态度，转而把这一切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运用学术的手段来论证日本人天生残忍、虚伪，却明显地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使自己滑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

民族主义有激励国民奋进的效用，但它同时也容易导致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民族国家矛盾，过分夸大他民族的缺点，甚至仇视他民族的倾向。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者都有一些日本友人，我们深知这些友人的可爱与真诚。甚至，正如方军在《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使是他随机采访的那些杀害过中国人的老日本鬼子，又有几个是残忍、虚伪的呢？他写道：“当年的老鬼子们不过是一群开机床的、种菜的、送信的、做木匠、开饭馆的、修铁路的、教书的、敲锤子的、当会计的普通劳动者，总之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人。”把他们变成魔鬼的，是战争，是战争环境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狂热政治煽动，并非是日本民族本身的特性使然。

战争会使人性扭曲，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不独日本人如此，德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不独日本人、德国人如此，中国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远的秦军坑赵卒、清兵屠扬州不必说了，近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因攘权夺利，自相残杀的战争就不在少数。国人所熟悉的名目繁多的刑讯逼供乃至坑杀异己的

酷刑,不少也发明在这近百年生死予夺的政治军事斗争当中。即使举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八年期间,不也还是出现了诸如皖南事变、平江惨案等一系列同类相残的悲惨事件吗?十分明显,只要在战争的环境下,只要摆在面前的是你死我活的选择,猜疑和仇恨的种子就必定会在原本善良的国民心中生根发芽和开花,直至结出罪恶的苦果。与其说它与日本民族的特性相关,倒不如说它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劣根性更准确。

今天,中日之间早已没有了战争,但是,在中日两国国民心中播种什么依然是一个极为现实且相当严峻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坚持批评日本当局对中学教科书问题的态度,正是希望能够在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深处中,种下热爱和平的种子。但我很怀疑,在我们希望日本人能够让他们的下一代了解日本当年对中国犯下过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在中国国民当中播种鄙视日本民族的种子,这能够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带来持久的和解与和睦吗?

中国有句俗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更需要和日本等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因此,尽管今天有许多人对当年国共两党坚持用以德报怨的方法来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我相信,它还是有效果的。至少我们一直到今天都可以不断地听到那些感受到这一政策恩惠的日本军人充满感激的话语,看到他们由此所产生的对当年战争行为的由衷忏悔。而他们的现身说法,至今还在日本民间产生着巨大的宣传效力。试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亲历者的声音存在,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鼓噪和影响,会不会更多更大呢?

日本不是德国,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全国上下都能在短时期内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历史。但是,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显而易见,

今天的日本就已经不是过去的日本了,我们虽然依旧会发出警告,但今后的日本已经没有可能脱出世界和平民主的轨道,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身为历史学工作者,我们理应具有历史的眼光,理应秉承理性和客观的精神来看待过去和现在,既不被民族主义情感所左右,更不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去影响国人。

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

步 平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也自然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对于两者关系的分析,有国际战略的策略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角度的不同层面的观察。不过,无论从哪一层面看,历史认识问题似乎都是不能回避与搁置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就是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积极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中日关系是很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不应让某些尚未解决的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我们的国际战略的确立。不过,回想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甚至中日间的经济贸易始终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互相依赖的程度,这些具有战略

意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其实不都是超越了历史认识的分歧而实现的吗?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当然首先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其他,对国际战略中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当然也基于国家利益这一原则。历史上的敌人不一定在现实中依然敌对,历史上的朋友在现实中也可能具有威胁。

而在国际战略的确立过程中,又不可能不考虑历史因素和历史经验。就中日关系来说,历史上就有“联日”与“拒日”主张的争论与策略的演变。战争的历史固然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上了句号。但是,战后近 60 年来,历史认识问题为什么一直横亘在两国关系中间,人们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而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的,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对这一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即借鉴历史的经验,正是确立科学的国际战略方针必不可少的一环。事实上,目前在日本社会发生的许多问题,如“有事法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谋求“正常国家”的问题等,都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至少是与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有密切联系的。这些问题不能说对中日关系没有影响。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不认识和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是难以建立起科学正确的国际战略的。

至于谈到中日民间的历史认识的分歧,确实是对两国关系很有影响的问题。情绪化的民族意识在两国都有表现(不过,那些所谓“民意测验”的科学性还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结合,利用民众的情绪推动政治的右倾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认识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本来就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回避和搁置的,何况还有发生在对方国家的事情,更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的。如果说从国家的角度确立国际关系的原则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从民间的层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更需要的是确立正确的理想与目标。而我们在这一方面应当有所作

为,不应也不能回避和搁置。

通过我们多年来对两国民众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研究,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民众层面的对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以及历史观三级领域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目前,两国人口的60%以上没有经历过战争,而历史教育的缺陷又加剧了历史认识的偏差。所以,双方的民众对战争历史的认识的“语境”是很不相同的。导致这一“语境”差异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能由民众自身来承担。有些人,也包括有的媒体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动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的历史观,可是忽略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民间,或者干脆将其与右翼视为一体,这是需要调整的偏向。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改变右翼势力的历史观上,重要的是民众之间的历史事实的相互介绍,历史记忆的相互交流和历史观的相互影响。或者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同日本右翼势力争取民众,而不仅是对右翼历史观的批判。

对于日本的社会力量的分析,不是用“左”和“右”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的,不可忽视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力量。对日本战后发展曾起了重要影响的和平主义思想也植根于这一中间层中。当然,他们一般来说是站在战争被害的立场上理解与反对战争的。由于这一点很难为中国的民众所接受,所以同样的对和平的向往却难以合成统一的力量。不过,客观地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而不是故意回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部分市民团体开始为认识日本的“加害”责任而努力,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能不能给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机会?这一情况应当引起两国政治家、学者与有识之士的关心与思考。争取了多数,少数自然就孤立了。

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近年来致力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而且同日本方面的历史学者共同进行

着积极的已经有了成效的工作。在日本社会中,也有许多在认真思考侵略战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也有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予以支持的市民运动,这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觉醒。在这样的努力面前,我们如何能主动提出回避和搁置历史问题?

对于能否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情况的确有许多模糊认识与误解。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好感”与“恶感”不足以成为我们确立科学的理性认识的基本条件。我们强调的 21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相互理解,是指在充分了解对方基础上的深层的理解。尽管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环境需要时间与条件,但是唯有这样才能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需要对我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引导,少一些指责;对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急躁,大家都来做踏踏实实和扎扎实实的促进工作,民众的有分歧的历史认识是会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化的。

面向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认识

[日]笠原十九司

(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通过留学、旅行、文化与学术交流,日中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在扩大和发展,在经济方面,也在渐渐地形成东亚经济圈的基础。21 世纪的潮流,正在向

以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或被称为东北亚共同体)的形成的方向发展。

但是,建设一个东北亚诸民族能够和平共存的东亚区域社会的道路并不那么容易。最大的障碍,是日本政府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没有进行“克服过去”的努力。正如有人分析的:“不反省则有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现在的日本使东亚再次陷入战争的危险增大了。今年,对于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与基本上“克服了”纳粹法西斯的过去的德国相比,日本政府的态度就是一个证明。德国政府与法国、俄罗斯、中国政府一同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主张无论如何应通过联合国采取和平的解决手段。而日本政府则无条件地支持违反国际法的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把“海上自卫队”所谓的“日本军”派到了波斯湾上。以后,日本政府又使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基础上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在实战意义上的“有事法”在国会上通过,从而确立了一旦美国为显示在东亚的统治霸权而发动战争时日本能够参战的法律的保障体制。将来,美国以朝鲜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为口实向其发动战争的话,日本就能够站在美国一方参加对朝鲜的进攻。日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的和平宪法进行“改恶”,加速使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而这一宪法是战败后的日本向世界表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谢罪理念的法律文件。

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讲演时说过一句名言:“闭眼不看过去,就是对现实的盲目”。而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历史“闭眼不看”的日本政府,就是对东北亚区域和平社会形成的潮流的“盲目”。本来,《日朝平壤宣言》(2002年9月17日)已经确立了日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正因如此朝鲜承认了“绑架”问题。但是日本却反过来关闭了解决两国关系

的大门。日本政府对过去帝国主义时期统治朝鲜殖民地的历史“闭眼不看”,导致日本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重要的课题成为“现实的盲点”。

大约在 10 年前,我曾经以《民间的“克服过去”的运动——与亚洲各国和解的道路》为题,写了下面的内容:

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体制,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为代表,连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都拒绝承认,而且还干涉国民自发地认识日本的侵略与加害的运动,甚至明里暗里地施加压力。而与战后一贯地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民众回避战后处理和战后责任问题的日本政府相反,日本的国民则有许多人在自觉地、有良心地努力推动“克服负面的过去”的运动,这是在拯救国际社会陷入某种孤立的日本,是开拓同亚洲各国人民和解的道路(尽管这一道路现在还不十分宽阔)。

遗憾的是,政府与国民的这样的差异至今仍然在继续着。而德国政府的领导人为取得与被纳粹法西斯侵略过的诸国的和解,在让国民认识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的同时,还对被害者谢罪和赔偿,基本上克服了纳粹法西斯的过去。这是欧洲共同体建立和德国取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重要的一步。而在日本,由政府放置的战争责任问题和由于“不克服过去”而产生的负面的历史遗产正压在日本国民的身上。只有把那些问题解决了,日本国民才能够实现与邻近的亚洲各国国民的和解,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信赖。

日本国民克服对殖民地统治的“过去”,最重要的是对日本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的认知”。在这一基础上,就像遗产的继承一样,战后的日本国民应当认识到自己对亚洲国民有赔偿及其他的战后责任,应当对侵略战争中的非人道的不法行为反省和谢罪。

笠原十九司:《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

而这样做,首先应对人权被蹂躏、被破坏的被害者和牺牲者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从内心感到难过,并与之有共同的感情,这样的反省和谢罪才是真诚的。为此,需要加害者与被害者在历史认识上的“共有”的“历史事实的认知”。

目前,日本与韩国之间以去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国民层面的对话,而且越来越深化。从某种程度,政治上逐渐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倒是从反面促使韩国的政治开放与民主化的迅速发展与成熟。

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和国民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话,主要由于日本方面的问题,进展还不是很快,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困难的问题。但就是在这样的困难中,以日、中、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市民为中心组织的第一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于2002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为了东亚和平的区域共同体的建立,三国相互地,特别是针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历史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样的论坛,可以说是为了建设拥有共同的和平与未来的东亚而在年轻一代培养历史认识的长期的努力的一部分。接着,2003年2月又在东京胜利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计划在2004年于汉城召开。在论坛上还决定由日本、中国、韩国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辅助教材,计划2005年出版。可以想象,关于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问题,由三国取得共识是有一定困难的。三国共同的辅助教材的编写的过程中肯定包含着对立与冲突。但是这一对话过程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在东亚,超越国境的民间的组织(NGO)与运动的作用将越来越显现出来,我希望为了谋求东亚历史认识的共有的论坛是开辟这一运动的先河,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加了。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新思维论”质疑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最近有一些学者针对国内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对日外交的“新思维”,其中两个重要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是“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二是为了国家大战略的利益,我们可以搁置历史问题。这两点都牵涉到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即历史问题,那么,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历史问题究竟能否搁置?

历史问题的内涵。二战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同亚洲受害国之间的战争并未因战争结束而达成真正和解。东京审判以及其后在旧金山缔结的“和约”,与其说是受害国正义的申张,还不如说是在冷战思维下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相互较量与妥协的产物。战后亚洲受害国在如何处置日本问题上,实质上并无多少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在冷战格局下显得相当残缺而不完整。20 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体制瓦解后,受害各国日益高涨的民权突破了国际政治的制约,加害国与受害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一下子凸现于各国民众面前,并进而成为加害国与受害国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障碍。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表面上来看是日本对中国的道歉问题,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事实层面。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残暴罪行,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和一些右翼学者却一直在试

图掩盖、歪曲和否认这些历史事实,诸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细菌研制与细菌作战、战时劳工、文物掠夺、无差别轰炸、战时军票等。在我们认为是铁证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们却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 20 世纪最大的谎言,诬称慰安妇是妇女自愿的商业行为,而中国的钓鱼岛则成了日本国的“尖阁列岛”。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层面,中日之间却未能达成基本共识。二是战争认识层面。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侵略与奴役,但是,日本一些政要和学者却将“侵略”美化为“圣战”,“侵略亚洲”美化为“解放亚洲”,“奴役中国”则美化为帮助“开发中国”。作为战争受害国的中国根本无法接受日本对这场中日战争的定性。三是战争责任层面。东京审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日本利用战后冷战格局和中国海峡两岸的矛盾,规避了许多应尽的战争责任,中国放弃了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要求,中国无辜受害民众至今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战争赔偿。自中日建交之后,日本虽然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援,但此点却成了日本对中国施压的政治资本。而对于中国受害民众而言,公理与正义一直未能得到申张。

对照上述三点,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本质来看,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日本道歉问题已解决的结论。

历史问题与现实相通。近几年来,由于研究课题的关系,我有机会经常同战争受害者接触,倾听他们的呼声。我最大的感受是中日战争虽早已结束,但是半个世纪前的战争创伤对于受害者而言却是现实生活中难以痊愈的伤痛。笔者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家住南京头条巷的张秀红老人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 12 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 3 名日本兵轮奸的痛苦经历;张玉英老人

尽管现处于精神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幸存者记忆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日军的残暴与恐怖,使幸存者终身难忘的还有大屠杀之后生存下来的痛苦经历与一种无望的期盼。杜秀英老人在其 8 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在大屠杀中,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在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 84 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她还在期盼被日本兵抓去的丈夫回来,我们无法想像她是如何熬过 2 万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的。

对于凡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而言,半个世纪前的战争显然不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腿部伤疤上的黑脓还在流淌,日军原慰安妇的躯体与心灵仍在遭受痛苦煎熬,侥幸生存下来的战时劳工带着满身伤痛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除了要面对战争创伤的痛苦煎熬外,让战争受害者最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是从日本仍继续不断传来否定侵略历史事实的谎言和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祭扫战争罪犯的活动。对于年老体弱多病的受害者而言,这段苦难的历史如何才能成为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直接经历战争的老人已越来越少,但是,战争创伤的记忆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它绝不可能嘎然中断,战后出生而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也同样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记忆。对于中国人而言,半个世纪前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在没有得到抚平之前,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很难随意翻过的。历史

和现实是相通的,我们不能搁置,不应搁置,事实上谁也搁置不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直面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障碍。避免中日关系恶化、追求中日永久和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目前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不在中国一方,战争期间中国是受害国,日本是加害国,日本现在不承认历史事实、歪曲战争性质、逃避战争责任是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何调整中日关系,日本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些学者从大战略的角度,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前提,提出搁置历史问题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这一建议表面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认为任何“外交革命”的新思维都不能违背下面三个原则。首先,国家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不能放弃,也决不应成为政治家进行交易的筹码,回避和放弃正义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形象。我们决不能以吸引日资发展经济为由而抹杀日本侵略过中国的历史事实,坚持正义和公理是我们立国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其次,国家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中国受害者的权利为代价。在二战期间,由于中国国力贫弱,民众的人权遭到日军肆意残暴无情的伤害,但是十分可悲的是,今天日本政府仍然不肯正视细菌战、性暴力和战时强制劳动等战争受害者的权利,甚至诬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历史证人。面对日益右倾的日本社会,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让这种悲剧继续上演。我们有责任有理由敦促日本政府正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而决不能为了讨好日本而再次伤害受害者的权利。再次,国家利益的获得不能以打击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左翼人士追求历史真相、促进中日友好的热情为代价。搁置历史问题的新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右派的需要,严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为了追求历史真相、促进中日友好和平人士的热情,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了中日

友好关系的基础。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但正义和公理催使我们必须客观面对它。我们强调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并不是要利用历史问题来获取什么经济利益。事实上,再多的经济赔偿对于年老的幸存者而言已失去任何实际价值,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换回受害者的健康和幸福,他们期待的仅仅是日本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坚持正义和平人士的努力下,两国政治家能从更长远的利益出发,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论中日关系研讨的思维方法

徐 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当前扑朔迷离的中日关系,促成了“立言”的活跃,一类“新思维”、实施“革命外交”的主张,最引人关注并造成了巨大分歧。它以自我批评方式批评中国方面有过头的民族情绪,表示要承认日本的发展就是亚洲的骄傲(自然就是中国的骄傲),或主张实施“革命外交”新策术。

这类主张聚焦于历史,其思维的特征和要点是:第一,强调眼前现实利益与历史问题不能兼顾的矛盾性;第二,要将过去的“屈辱”历史完全“撇出”议题之外;第三,要防止历史记忆和感情因素的干扰,要以可以满足右翼势力愿望、近乎“矫枉过正”的“革命外交”亲善策术,换取进一步的中日“接近”;如大力感谢日本经济援

助、“足够大度”地认同日本军事力量扩充、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总之,这些“立言”不了解、不分析历史渊源,却从方法策术角度,否认历史因素是思维决策基础。

如此直白要求割断历史的论点,确实甚为少见。究竟如何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历史因素是否只能排斥现实利益而不能为之服务,学术与国策有何关系,学人自身如何把握建言的立场与责任等等,这些有关思维方法的问题如果得到澄清,可以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解。

二、所谓历史就是指时空的延续过程。综合广阔深远的时空关系以解读眼前的局部现象,洞悉事物演变及其相关研究进程,这应该是解决任何科学、也是社会国家问题的基本方法。企图斩断时空延续,抽象“跨越”、“撇出”历史的说法,显然有悖于事物常性与思维常理。

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时空的延续性。古今中外的国家外交早已证明,无论是战争或和平、退让或进取的政策决定,都不能没有历史的依据。现实利益或许具有某种排他性,但并非惟有妥协才能获取,由正义的抗争赢得大局的根本稳定,这是政治艺术更是普遍的国际法则。

过去两个世纪的中日关系演变,含有严峻而明确的教训。中日关系的恶化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造成的。通过 1868 年明治维新,日本取得现代化成效,立即“怀势力之心,以观文化”,割裂东方文明五千年发展史,自视为文明上国。按福泽谕吉 1885 年《脱亚论》的表述,虽然身为亚洲国家,却要在精神上坚决地脱离亚洲,走进欧洲国家行列,还要像欧洲白人国家那样惩罚中、朝等“丑陋的邻国”。

章炳麟批大隈重信语,转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12 页。

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实践了这样的理念,奉行失之欧美、取之东亚的弱肉强食武力政策,进行了日本右翼作家自傲宣称的“百年战争”。

对比已经成为有组织效率的强国日本,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封建落后状态。晚清政府和李鸿章,曾推行以妥协为主的避战外交。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曾接受日本的《廿一条》,缔结屈辱的《民四条约》。30 年代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推行过“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力图以妥协来迟滞日本已经发动的侵华战争。上述历届中国政府的退让,都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的欲望。日本不理睬中华民族连绵高涨的解放意识,不接受孙中山的不要做列强侵略的鹰犬,要做捍卫亚洲和平的干城的劝告;更无视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出的不要坚持“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等警告,持续扩大对外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以近百年的对外侵略,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血腥的一页,也是任何坚持正义、和平、民主的国家与人民欲忘不能的历史。

三、凤凰涅槃、世道轮回,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中华民族及东方人民饱经磨难而终于胜利崛起。许多日本人士坚持正义,成了中国人的朋友。战后中日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善,两国在 70 年代恢复正常国家关系。至今,就日本学界及民众的层面上说,和平睦邻意识占据主流地位。

由于战后世界“冷战”,中国出现内战,美国大幅度地修改对日占领政策,诸多因素使日本的战后民主改革不够彻底,其军国主义

此为右翼作家林房雄语,见〔日〕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昭和 46 年。

以上引文出自蒋中正:《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转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附录及其他文献。

势力没有受到深入追究。日本各方面都得到了比德国更为宽大的待遇。日本战犯被起诉人数少,量刑轻,追查时间短,恢复政治自由快,不久就出现了一批日本学者所称的“战犯政治家”。如1954年任日本内阁首相的鸠山一郎、1957年首相岸信介,以及1954年出任外务大臣,其后最高职务任内阁副首相、参与了整个15年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重光葵,等等。“战犯政治家”们在50、60年代即开始活跃,担任社会要职,决定了日本的内外政策迅速右转。这些因素与战后经济发展后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战犯关系压力集团等产生综合作用,蔓延为日见壮大的新军国主义。

所谓新军国主义,乃是存在于当前日本的一种与战后改革所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相对抗的势力。它公开、直接为战前的军国主义翻案,在社会、政治、军事诸多领域拥有不可低估的实际力量。

日本新军国主义有参拜靖国神社,及教科书等是多方面的表象,笔者这里仅强调其军事表现。日本军费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二,海、空军技术与力量为东亚第一。日本政府已经越来越习惯地使用武力手段,屡屡违背宪法第9条规定而动辄使用飞机、军舰。如在钓鱼岛使用武力驱赶中国民船,导致香港爱国人士陈毓祥罹难。更在海上公开动武,击沉了一艘国籍不明“间谍船”。日本具有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并已初步完成了有事立法等超越和平宪法运用武力的法权准备。日本借口反恐和朝鲜威胁,大力推行强军战略,向印度洋并已决定向伊拉克出兵,这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标志性举措。

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了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惨剧,留下各民族间永远的记忆伤痕;而日本新军国主义的滋生,造成了东亚地区现今的政治困惑,也使日本国内的民主、进步力量面

临严峻挑战,处于艰难境地。

四、历届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都以和平睦邻为宗旨。从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到毛泽东、周恩来基于不要加重日本人民负担而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想法,都证明了这一点。中日关系现今症结完全不在于中国方面过多“计较”历史、或有过头的民族情绪。中国本着传统的“恕道”,在战争索赔这样最重大的问题也礼让或宽谅对手,期盼对方能够自我认识。

本来,日本有一个优美的“仙鹤报恩”民间故事,但日本右翼和一部分政治家们,接受了中国及盟军多方面的恩惠待遇,却背弃了知恩明义的传统美德,严重伤害了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感情。“解铃还需系铃人”,中、日及东亚区域关系的真正改善,有待于日本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

中、日两国和亚太地区人民,应当像西方人民对待新纳粹主义那样,对日本新军国主义以足够的警觉和坚决的反对。绝不能在缺乏历史反省的状态下,支持其成为军事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饮鸩止渴、轻率从事,满足于策术效果,将有害于日本的进步力量,有损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利益。日本新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进一步得志,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狼烟再起。

中日关系当以经济、文化、科技的合作交流为要务,却不能放弃历史、政治领域实行抗议与批判的权力。作为现实的国家外交关系问题,主要是国家的权力进行运作,和常规的学术性研究有明确的区分。但任何问题都可以纳入专门研究的视野,成为学术探讨的对象。真正行之有效的正确决策,是在充分、可靠、全面的科学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意义。

学人“立言”,贵在创新,但草草于“王者师”式的“奏折”文章,无视科学的时空轨迹而对于历史随意剪裁,方法论失误就会导致思维谬误,就会对事物本质严重误读。今天的东亚不再是福泽谕

吉等所蔑视过的东亚,中华文明复兴大业已经启动,这也是举世公认。斯时斯地,富于入世传统的中国学人,在科学研究中关怀现实,为国策提出建言,务必需要慎定勿躁,坚持学术的良心与责任。

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分祀”问题

[日]高桥哲哉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在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中,“靖国问题”公认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日本的小泉首相自前年就任首相以来,在国内外的批评中三次参拜了靖国神社,看样子今后也不会停止。每次参拜后,中国和韩国都会发表抗议的谈话,成为日中间很敏感的政治问题。

靖国神社历史上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设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鼓吹“大日本帝国”所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正当的历史观的场所(神社内“游就馆”的展览就是证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违背了日本宪法上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当然也引起国内外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怀疑。毫无疑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极不应当的。

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我想就靖国神社中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谈一谈看法。有人认为,只要将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分出来,首相就可以参拜了,“靖国神社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种看法似乎有一些道理,其实不然。这样单纯强调甲级战犯问题,会把日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其他本质问题忽略了。

目前,靖国神社问题在表面上看是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重点。最初提出所谓的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是在 1985 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之际,中国政府以靖国神社中“合祀了东条英机等战犯”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小泉首相第一次参拜前的 2001 年 7 月,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曾说过:“参拜一般的战争死亡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是靖国神社中合祀了甲级战犯。”但是,强调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并不是说其他的事情就不成为问题了。其实,“首相参拜把甲级战犯作为神的神社,是对战争责任的否定”,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政府始终采取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日本国民”区分开的原则,认为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85 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中指出: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根据这一认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外的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政府的这一认识,是以“中日友好”为目标向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是呼吁受到日本军队莫大伤害的本国国民,说服他们抑制“民族复仇主义”的理论。站在这一立场,中国等被害国做了最大幅度的政治让步。所以,认为甲级战犯以外就不是问题的立场,是与战后中国政府多次表明的战争责任论相呼应的。

可是,在靖国神社里,除了甲级战犯外,还祭祀有大量的乙、丙级战犯,还有更多的不属于战犯的在日中战争中死亡的大将、中将等日军指挥官。将甲级战犯“分祀”(从合祀者中拿出去)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是出于“不追究乙、丙级以下战犯的战争责任作为靖国神社问题政治解决的出发点”的考虑(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中曾根内阁曾经讨论过甲级战犯“分祀”的问题,也可以说

是那一认识的政治“合理”性因素的对应。

其实,靖国神社和遗族会都是强烈反对甲级战犯“分祀”的,所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不管能否实现,甲级战犯“分祀”只不过是靖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不注意其他的问题。

首先,甲级战犯“分祀”的方法并没有解决战争责任问题,只不过将战争责任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甲级战犯罢了。设想一下,如果甲级战犯实现了“分祀”,天皇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靖国神社进行“御参拜”(要求首相参拜的那些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天皇的“御参拜”)了吗?而那样一来,就是在重演东京审判中最大的政治问题,即:作为日本帝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天皇不承担战争责任,而由甲级战犯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一般的士兵”,当时不管其愿意与否,只要接到命令就必须参战。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受害者,但也需要明确,在战争中他们毕竟是有直接侵略行为的加害者。按甲级战犯“分祀”的理论推理,这些人的战争责任就烟消云散了。而由于将那些“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战死的军人、军属当作神来祭祀,就更无法追究在动员日本国民参战中起到决定作用的陆海军省所管辖的“战争神社”——靖国神社的责任了。

第二,甲级战犯“分祀”论掩盖了靖国神社与日本殖民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靖国神社中还合祀了出身于日本原殖民地台湾的2.8万人,出身于朝鲜的2.1万人,合计约5万人的“异民族”的战争阵亡者。1979年2月,来自台湾高山族的7人遗族代表团首先提出将台湾人从靖国神社中分出来,但是遭到靖国神社的拒绝,理由同过去一样,称那些人“战死的时候是日本人”。2001年6月,韩国的55名遗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拒绝合祀”的诉讼。他们认为自己的亲人在战争期间被征兵,但是战死后没有得到通知书,也没有见到遗骨,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合祀”到靖国神社,因此

拒绝“合祀”。可是靖国神社一方面拒绝韩国遗族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则把参与对殖民地的侵略和镇压当地抵抗运动而死亡的日本军人继续作为神祭祀起来。1933 年靖国神社发行的 5 卷本的《靖国神社忠魂史》中,除了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外,还列举了在攫取和统治殖民地的过程中被动员而阵亡的日本军人、警察,有他们的名字,所属部队,他们的身份,出生地,死亡日期及详细的“战斗经过”。那些事件包括从 1874 年出兵台湾开始到 1882 - 1884 年的朝鲜“壬午之变”,甲午战争后的“征讨台湾”(1895 年)、“合并”韩国后的“镇压韩国暴徒事件”(1906 - 1911 年),镇压台湾当地居民的“台湾理蕃”(1896 - 1915 年)、“台湾雾社事件”(1930 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匪贼”和“不法鲜人”的“讨伐”(1931 - 1932 年)等。审判甲级战犯的东京法庭只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情作为战争责任问题处理,对上述问题根本没有追究。因此,甲级战犯“分祀”论就掩盖了近代日本殖民主义与靖国神社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果将“靖国问题”作为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来思考的话,就不仅是甲级战犯的问题,而且应当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般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靖国神社的战争责任问题及近代日本殖民主义的问题等结合起来思考。

(责任编辑:荣维木)